



4

灌云报

GUANYUNBAO

责任编辑 侍述清 陈洪艳

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电子邮箱: gyssq@163.com

往事·网事

关注“今日灌云”微信公众号 掌上阅读《灌云报》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前后

刘少奇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后，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他为大会的筹备与召开、为大会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协助毛泽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付的各项艰巨任务。1943年春，他奉命回到延安。其后，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成为毛泽东的一位主要助手，协助他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等多方面重要工作。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同时决定，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

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刘少奇继续把全部的心血投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之中。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协助毛泽东从容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上。进入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为挽回败局，日本侵略者犹作困兽之斗，于4月中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短短8个月丢失了约2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146座大小城市。一时间，民怨沸腾，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全面的政治危机。

面对时局的剧烈变化，刘少奇参与领导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6月23日，他与陈毅电示新四军：“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此后，他又和毛泽东、陈毅等同志一起，多次致电有关方面，对如何在河南、湘鄂赣和苏浙等地区开展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他还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许多著名的军事行动。如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派南下支队向豫湘鄂赣敌后挺进，执行开辟新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刘少奇参与负责了相关准备工作，并对部队行军途中诸多事项给予关怀指导。

在这段时间中，刘少奇工作安排得格外充实，他密集出席各种重要会议，为中央起草大量文电，和相关同志进行工作谈话，在加强城市工作、加强根据地生产和政权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参与领导七大筹备工作

在七大筹备过程中，刘少奇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责。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时，刘少奇即为25名委员之一。后来，由于战事紧张等原因，大会屡有延期，但刘少奇始终对大会的筹备予以高度关注，并做了许多工作。如1940年8月，时任中原局书记的他专门对华中的七大代表作报告，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1944年5月，他还参加了任弼时负责召集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道：“可以说，七大前后是少奇同志在延安工作繁忙的一段时间。为了开好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少奇同志曾集中精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刘少奇承担的工作中，有一项尤其广为人知，那就是主持修订党章和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时，决定由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入党）报告。为完成这项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刘少奇撰写的许多著述都是建党理论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曾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教材。此时，刘少奇又特意对党的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并在为中央派往外地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围绕民主集中制、群众观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刘少奇还多方收集各种资料，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45年2月，他为中央组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七大即将举行，要求各地电告“党员总数（部队党、地方党及沦陷区党）。经过统计，中央不但对全党人数有了准确了解，而且根据各地党员的具体人数，相应调整了七大代表名额。经过艰辛努力，特别是反复的集体讨论修改，相关起草工作稳步推进。草稿脱稿后，刘少奇还专门于3月7日主持召开党章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经过认真讨论后，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为七大胜利召开和大会路线贯彻执行作出卓越贡献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开幕。在毛泽东致开幕词后，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先后发表了讲话。对这次“盼望了多少年的”大会的召开，刘少奇满怀喜悦之情，他明确指出：“我们大会应该动员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为着新中国光明的前途而斗争”。大会期间，刘少奇做了大量领导工作。在大会召集的21次全体会议中，他先后两次担任会议执行主席。这两次会议都承担了重要议程：前一次听取了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第二次则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通过了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刘少奇还多次参加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以及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参与讨论决定了诸多事宜，对大会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5月14日和15日，刘少奇用了整整两天时间，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论述了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此后，刘少奇在5月30日作关于讨论修改党章报告的结论时，又对代表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逐一加以解答。刘少奇的报告，得到了高度评价。胡乔木曾在忆及这段历史时说道：“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

在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刘少奇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继续协助毛泽东为七大路线的贯彻执行而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关头，努力做好统战、城市接管等各方面工作，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此后，他又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战后，联邦德国（西德）工业得到快速恢复，但由此产生的酸雨致使西德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损害。受酸雨影响，枯死病在西德森林中蔓延。为此，西德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与各方利益博弈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阵痛过程，相继建立了相应的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并制定了产业转型和森林修复措施，其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森林存量大幅提升，其典型案例，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镜鉴。

森林枯死病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西德森林枯死病事件，是指受酸雨影响引发西德740万公顷森林相当一部分遭受污染而枯死。截至1983年，每年枯死蓄积量超过同年森林生长量的21%，34%染上枯死病，先后有80多万公顷森林被毁。在巴伐利亚国家公园，几乎每棵树都得了病，黑森州海拔500米以上地区的松树也相继枯死，汉堡也有3/4的树木面临死亡。在鲁尔工业区的森林里，秃树、死鸟、死蜂随处可见，居民的生活更是受到严重的损害。因空气污染，这里每年有数万儿童感染特殊的喉炎症。此次事件，也因此被西德社会环保组织称为“生态广岛事件”。

促进西德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森林枯死病事件发生后，西德不仅相继出台了系列严密的森林修复措施，还促进程政府制定颁布了更加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建立起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

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环境保护运动就开始登上了西德政治舞台。1969年政府换届，现代环保政策与法律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得以锚固。1974年西德出台了《联邦污染防治法》，之后在其基础上针对西德地区的森林枯死病事件，1985年颁布《赤枯病防治条例》，1987年颁布《植物保护信息分类管理条例》，1989年颁布《植物检疫条例》和《联邦物种保护条例》。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林场主对林业适用地、保护能力的责任，还涉及周边企业对森林保护的责任，从而将森林保护条例进一步具体化和条例化，为森林保护事业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西德政府还制定了针对大型企业排放标准的《有害物排放法》《水法》《废物处置法》等，从而完成从事后追责到事先防范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型。

创新环保技术建立了生态数据库。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四级标准为依据，西德建立了现代化环境监测设施，以减少有害气体排放。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法规和监测迫使污染型企业升级了环保设备，促进了西德企业环保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态环境数据库，创新了相关科研人员对森林系统研究的方法，更新了西德森林生长和死亡的真实数据。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借助生态环境数据库，在有害物质对人类的影响、污水处理的新方法、空气脱硫脱氮、研制无污染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唤醒了民众环保意识。森林枯死病的发生引起了西德民众的重视，随着环境大讨论的不断深入，不仅促使环保议题逐渐由普及森林保护知识、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向反对公路机场大型污染场域等议题扩展，还增加了如环境和自然保护联盟等环境团体的数量和影响力，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从而使该地区环保事业逐渐向职业化和建制化转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往森林枯死、乌烟瘴气、废水肆意的鲁尔区森林恢复了生机，空气变得清洁，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

经过一百多年的生态环境治理，如今

的德国已经从森林枯亡、江河污染、粉尘漫天的生态危机中走出，其成功转型经验，可以为广大传统工业国家提供借鉴。

协同合作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如何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从西德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可以清晰看到，一是政府积极主动引导，二是企业严格执行、民众积极参与。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在国家层面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环境治理体系，制定多层次的环境立法，加强环境单行法和部门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还需要企业创新环保技术，促进工业生产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同时，相关专家以及社会环保组织应积极为生态环境治理建言献策，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有关环保规划、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环节中去。此外，加强三方协同合作，打通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环保行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绿色发展，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赋能绿色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为西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势能。对于我国来说，需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情况，推动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低附加值、低开放度、高污染与高资源消耗基础设施向高水平、高附加值、绿色化和高开放度升级。在具体行动中，一方面，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新发展结构。另一方面，在新旧产业集群重构的波动中赋能绿色发展，创造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

绿色科技经济手段增强环境治理成效。从事后追责到事先防范的环境治理手段和绿色环保技术的创新，为西德治理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技术支撑。对我国来说，一方面，需要彻底根除一些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及其综合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完善相关的环境补偿措施和环境污染惩罚措施，规定工业部门和企业必须为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责任，将排污者污染的责任具体化为经济赔付行为。此外，在现实举措中，可以通过制定能源税、电力税、汽车税、垃圾污水处理费等生态税费改革，建立碳交易体系和排污交易权体系，灵活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促使企业和民众节能减排，打造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适度的社会风尚。

“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军事”

余秋里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长征时的一次战斗中他失去左臂，靠着剩下的一条手臂走到了革命胜利。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人称“独臂将军”，也是中将中唯一担任过副总理职务的将军。

一条左臂“换回”一位共和国中将

1914年11月15日，余秋里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坪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生在秋季，父母便给他起名为秋里。1921年，7岁的余秋里进入村私塾读书，因家中生活困难，1924年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种田。1929年，吉安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年仅15岁的余秋里不堪忍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毅然投身革命，参加吉安的农民暴动，随即参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同年12月，余秋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余秋里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1936年3月12日，长征中的余秋里奉命率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在战斗过程中，为消灭谷底敌人，团长成钧站起来查看地形，余秋里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敌人枪口正指向这里，他大喊一声“危险”，急忙伸出左臂把成钧拽倒。枪响了，成钧得救了，余秋里的左臂却被敌人击中，简单包扎后，余秋里继续投入战斗。不幸的是，他的左臂再次被敌人击中。虽左臂两次负伤，余秋里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掩护全军撤离。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行军、战斗中，伤口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但余秋里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剧痛，坚持随军北上，爬雪山，过草地。伤口发炎腐烂，为了止痛，他就把受伤的左臂伸到冷水里泡一泡。伤口怕太阳晒，一晒就火辣辣地疼，行军的时候他就尽量找有阴凉的地方走，没有阴凉，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用湿毛巾敷在受伤的左臂上。就这样，余秋里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00多个日夜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继续北上长征。等到甘南战役后，余秋里的左手已干燥、发黑，左臂红肿，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余秋里失去了一只手臂，却“换回”了一位共和国中将。被他救下的成钧战功赫赫，也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成钧多次说：“长征时，要不是秋里那条胳膊，我早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啦！”

“一把手”打出个天下第一团

1939年，在贺龙的指示下，余秋里同贺炳炎搭档，在冀中组建了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余秋里任三支队政治委员。因余秋里和贺炳炎都曾在战斗中失去一只手臂，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为“一把手”。余秋里领导三支队取得新城县板家窝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打出了三支队的威风，附近的游杂武装纷纷慕名归顺。这些武装，政治目标复杂、组织成分复杂、内外关系复杂，有的军官还存在浓厚的军阀作风和土匪习气。如不加以改造，必然影响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于是，余秋里和贺炳炎利用战斗间隙，把部队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蠡县和安平县交界一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整训。经过整训，这些收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完成从游杂武装向八路军的转变，大大充实了三支队的力量，使其独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百团大战后，三支队整编为第八团。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余秋里带领八团在战火硝烟和艰苦环境的磨炼中越战越强，成为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个主力团，并屡建奇功。1949年，第八团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贺龙评价说：“八年抗战，余秋里打出了个天下第一团。”

一直升任军部秘书处长。1934年，池峰城调升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两年后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丁行经常为池峰城出谋划策，提治军建议，在整肃风纪、统一军令、安定军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隐藏共产党员身份，不动声色用爱国爱民的思想和行为影响池峰城。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丁行感到这是发挥自己桥梁纽带作用的好时机。征得池峰城同意，丁行主动与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安平津流亡同学会接洽，组织了一支由进步知识青年和文艺人士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执行党组织统战工作的任务。

1938年3月20日，第三十一师到达台儿庄前线。丁行满腔热血，为部队拟定了简短而又震撼人心的战斗口号：“第三十一师誓与台儿庄共存亡！”部队进驻后，丁行带领战地服务团立即开展作战动员，印发对敌宣传材料，在要道口为行军路过的官兵们演唱《大刀进行曲》，提振部队士气。服务团还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对抗日讲演、唱抗日歌曲、演短剧，组建民众担架队、慰问队等支前队伍，支援前线抗战。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服务团组织协助前方运送弹药，送水送饭，接收运送伤员，为前线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艰苦鏖战，台儿庄取得大捷。丁行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率领战地服务团为战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练兵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1943年10月，为积极响应党中央“边区部队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的号召，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余秋里带领全团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大练兵运动。为把大练兵运动领导好，余秋里坚持把毛泽东“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到大练兵的全过程，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改革。在明确练兵为打仗的指导思想后，余秋里突破以往技术训练、战术训练齐头并进的传统，更加突出技术训练，以练兵能够直接用于消灭敌人的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为主，一批技术尖子脱颖而出。

余秋里改革训练方法，实行“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的方针，不再是领导要群众练，而是群众把练兵当成自己的事，想练、要练、自觉练，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练兵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的竞赛活动。全团每天公布个人及班、排、连的训练成绩，这一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练兵积极性。大家争分夺秒，不分白天黑夜，利用一切机会练本领。《战火报》对此曾有这样一段描述：这里，很难说哪是训练场，因为处处都有战士在训练；很难说哪是训练器材，因为所有能够利用的物资和工具都被战士作为训练器材得到了巧妙地运用。为此，干部多了一项思想工作，不是如何督促大家抓紧时间多练，而是苦口婆心劝大家好好休息。至1945年3月第二次冬训完成，为期1年零5个月的大练兵运动宣告胜利结束。这次大练兵增强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为适应我军发展和对日战略反攻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部队进行符合我军作战特点的军事训练摸索和总结出了比较系统的经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练兵方法，指出“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为人民战士

1947年11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内线反攻即告结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部队连续作战，没有来得及进行全面整训，暴露了不少问题。大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补充进部队，在部队中占大多数。这些“解放战士”虽然大多出身贫苦家庭，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受到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不少人阶级界限模糊，觉悟不高，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一些干部虽然看到我军不断胜利，但担心今后更加艰苦，战斗更加残酷，斗志有所减退。针对这些问题，彭德怀决定利用战斗间隙，在野战军内进行一次整训。

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秋里针对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提出整训应以提高觉悟为重点，从开展新旧军队对比教育入手，即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基本上解决了部队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增强了军内外团结，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指出：“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诉苦三查”主要内容的形式整军运动随之向全军推广。

潜伏敌营二十载的丁行

“北平五烈士”的5位国民党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为共产党传递情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5位烈士中年龄最大、踏上革命道路最早的是丁行，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进入国民党军中任职，在国民党军队潜伏了整整20年。

隐蔽身份为抗战服务

丁行1908年出生在山西夏县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考入进步色彩浓厚的夏县平民中学学习。1927年，丁行毕业后在家乡任小学教员，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在农村发动农民运动，丁行遭到国民党抓捕。1928年，为躲避追捕，丁行离开家乡，到西安加入西北军，在池峰城部队下任职。他文采斐然、足智多谋，深得池峰城信赖和器重，从文书、书记、秘书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轮番提审，丁行坚持斗争，没有选择离开。29日下午，丁行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羁押在北平的河北军人监狱，两个月后被转移到南京。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轮番提审，丁行坚持斗争，没有选择离开。29日下午，丁行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羁押在北平的河北军人监狱，两个月后被转移到南京。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轮番提审，丁行坚持斗争，没有选择离开。29日下午，丁行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羁押在北平的河北军人监狱，两个月后被转移到南京